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书海泛舟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能力

□ 王　君

在中华文化中，“三”是个极其重要的数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人谋划大事，历来用“三到五年”的时限设定目标。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已满三年。这三年，新一届党中央，胸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锐意进取，以大气魄治党治国治军，以大手笔运筹国内国际大局，以大布局推动改革发展进程，开启了共和国振兴强大的新气象，开创了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新局面，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众所周知，这三年是极为不易的三年，极不平凡的三年，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三年。从某种意义而言，只有读懂了这三年，才能更好地看清中国发展方向，看准中国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发展未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近期隆重推出了周新民同志的新著《核心能力——读懂治国理政这三年》。该书通过独特的视角，运用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系统解读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科学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核心能力的本质内涵，推动了领袖核心能力研究特别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能力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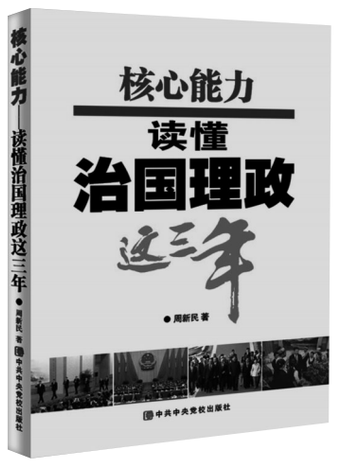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紧紧围绕解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能力这一主线，论述循序渐进、逻辑清晰严谨。“习近平治国理政成就概述”，对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举措和主要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解读”，用“以清醒坚定的政治定力掌控大局方向、以现代科学的治国思想引领国家发展、以持续不断的变革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以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凝聚复兴力量”四大维度对治国理政方略进行了本质剖析。“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之道”，对治国理政伟大实践进行了深度探究，既分析了治国理政实践的显著特征，又挖掘了治国理政实践的哲学底蕴，还透射了对未来的深远影响。“中外杰出领袖治国理政才略本质”，对中外杰出领袖治国理政才略的共性特征进行了深度挖掘，揭示了杰出领袖人物才略共性特点。“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能力内涵”，对习近平总书记拥有的治国理政核心能力本质内涵进行了精准提炼，构建了“政治意志力、全局掌控力、变革创造力、凝聚感召力”四大结构性核心能力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能力演进轨迹”，从优秀家风、逆境成长、丰富经历、不断学悟、修炼党性等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核心能力形成和发展轨迹进行了追本溯源。“树立领袖核心能力标杆的时代价值”，对治国理政核心能力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综观全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亮点。

一是富有创见。该书运用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通过对三年来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全面、系统、深入分析，实现了领袖人物核心能力研究破题，不仅形成了更加完整的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体系，使体系整体构架更加严密、更加系统、更有张力，而且把领导科学研究特别是核心能力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突破了传统意义从政治行为和政治体制角度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思路，打开了一扇从政治家角度发展政治学研究的新窗口。

二是系统深刻。该书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成就、方略与思想演进脉络，又深刻展示了党的新一代领袖的视野、胸怀和核心能力构成；既涉及治党治国治军三大主线，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既剖析中外杰出领袖治国理政才略共性特征，又展示了中国领袖治国理政核心能力的个性特质。同时，本书跳出了一般意义上就事论事的文字解读窠臼，而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背后的支撑要素，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探索呈现，既揭示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真理性，又展望了对未来中国的深远影响。

三是视角多维。视野宽阔、视角多维是该书的又一特点。既从现实的维度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核心能力催生的实践成果，又从历史规律的维度研究了领袖人物核心能力的共性规律、历史启示；既从哲学支撑的维度研究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能力形成的理论基础、精神实质、科学内涵、辩证关系，又从实践路径的维度研究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能力的演进轨迹，从而实现了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才略本质特点全方位、系统性、深入化、立体式的解读。

四是立意高远。该书研究的是中国当政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体现的是当下党情世情国情背景下的最新要求，解读的是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最新思想，形成的是社科理论尤其是领导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蕴含了最现实的时代要求和最鲜活的时代价值。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紧学习好、深刻理解好、准确把握好、高效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该书可以帮助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增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执行的自觉性、创造性、实效性，有力促进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而从思想源头防止方向偏移、政策空转、制度失效、执行梗阻现象发生。



（作者系《核心能力——读懂治国理政这三年》一书责任编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培训部举办第十一期『大有读书茶座』

□ 苏　民　李可东

5月17日晚，第十一期“大有读书茶座”在中央党校大有书局举行。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作者俞可平教授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副校长王东京，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罗宗毅出席。

俞可平教授介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他认为，治理和善治是全新的政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也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要根据中国经验，创建有影响力的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在国际社会的治理评估中掌握话语权。

俞可平教授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为重要的次级体系。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即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效果。这三个问题对应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制度和机制、治理工具。

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其二是民主化；其三是法制化；其四是治理的效率；其五是治理的协调性。

他谈到，当前我国在国家治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必须采取突破性举措。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凡是有利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政策，都应大胆探索。二是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是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四是既要学习中国传统治理国家的好做法，也要大胆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五是要破除官本位观念。

俞可平教授认为，只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主法治的进程。

讲解结束后，多名党校教师、学员围绕国家治理与俞可平教授进行了热烈深入交流。

最后，何毅亭常务副校长做了点评。他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今天的读书活动，俞可平教授的讲解，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的解读和宣介。这次读书活动准备充分、主题演讲内容丰富、互动交流气氛热烈，效果很好。他谈了三点认识和体会：

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明确的时间表。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21年左右就是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到这个时间节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平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的提升和进步。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与法治的状况。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民主与法治。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长期过程。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首先是干好下一个5年，然后，干好下一个30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体、制度、工具这三个要素都很重要。从我们个人来讲，重要的是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归结起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要努力，我们每个人也要努力。

大有读书茶座

公共服务外包后政府如何监督

——《PPP革命》一书的启示

□ 尚虎平

最近，一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校学生魏则西因医治不力而去世的新闻成为了社会的热点话题。就表面而言，这个话题似乎是医院医术不足所致，但稍微深究一点，就会发现它的根本诱因在于公共管理技能的缺失。为魏同学进行治疗的科室实际上只是医院实行“公共服务外包”的机构，它在具体运营上属于私有企业性质，医院鲜对其日常性的工作进行干预。尽管公众可能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公立医院拥有私人外包科室的事实，但公共机构推行服务外包实际上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做法，在国际范围内也是通行的。从全球来看，公共服务外包被认为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政府自我革命”，它有效衔接了市场、政府、社会，使得市场、政府、社会单独不能扮演好的角色、不能履行好的职能有了可靠的抓手。然而，公共服务外包有着“内生性”问题：承包者为了赚钱而罔顾公共机构的合同要求、罔顾公共利益，而公共机构往往由于缺乏时间、缺乏人手、缺乏专业方法来监督承包者的日常工作，这就使得公共服务外包常常走向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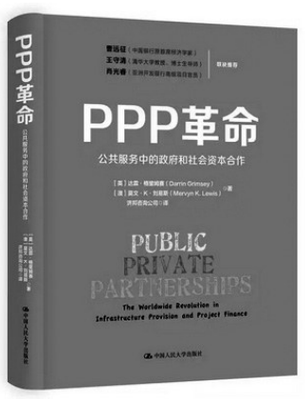
虽然公共服务外包后对承包者进行监督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也是有规可循的。公共服务外包大师达霖·格里姆赛与莫文·K·刘易斯所著的《PPP革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一书，就是一部公共服务外包中如何监督承包者的操作指南。

总体来看，《PPP革命》一书廓清了三个问题：为什么使用公共服务外包、如何使用公共服务外包、如何监督外包以免其成为脱缰野马。

公共服务外包的本质是处理好“公私伙伴关系”（PPP）的问题，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老问题，也就是解决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是传统的政府—市场关系那么简单线性，而是政府系统内部本身也可以引入市场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老观点来说，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生产并提供，这是优于市场的安排，因为它涉及公共利益、涉及规模经济等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新的公共服务项目如高速公路、海底隧道、光纤入户、公共无线网建设等，政府既缺乏生产它们的技术，也缺乏生产它们的资源，这就不得不向市场寻找办法，将这些公共服务外包给专业企业来生产。另外，即使那些传统的公共服务，比如武器生产、政府公务人员培训、抗震救灾等，政府也缺乏生产它们的资源与专业技能，从“多快好省”的经济学原则来说，将其外包给专业企业也更节省成本。因此，在《PPP革命》看来，政府专业技能、专业人员、必须资源的不足，是实行公共服务外包的“物质性”基础，而节省成本扩大产出则是公共服务外包的“经济人”基础。

如何正确有效地使用公共服务外包，这是《PPP革命》的核心内容。概而言之，周全的外包工作需要做到：第一，厘清这种公共服务属于“硬经济”领域，还是“硬社会”或者“软社会”领域。第二，梳理在这项公共服务上的政府核心职能范围，然后确定出引入公共服务外包的最佳时间点。第三，在BOO、BOOT、BOT、DBF、DBFO、DBO等具体模式中选择最适宜的模式。第四，厘清外包目标，形成外包合同。第五，企业与政府共同审核合同细节，确认责、权、利无误后签订合同。第六，进行合同管理，按约定履行合同。这几个方面依照流程顺序实现之后，特定的公共服务外包工作就算完成了。

当然，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签订，仅仅还只是一个把箭射出去的过程。当箭射出去之后，如何随时监控使其准确地命中目标，这是公共服务外包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如果这个工作不到位，就会使得某项公共服务处于失控状态，甚至会成为私营企业罔顾社会道德、罔顾国家法律的赚钱工具。针对这个外包中的难点问题，《PPP革命》提供了两种解决途径：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与全过程的合同管理。在风险管理中，需要处理好技术风险、建设风险、收入风险、财务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环境风险、项目本身的失败风险。风险本质上是无法完全规避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制作风险侦测矩阵，然后推进“风险分担”战略，使得各方可能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与风险管理不同，合同管理在操作中要简单得多，它类似于国务院强调的“痕迹管理”，只要所有环节均严格按照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办事，每一步都能实现合同约定的公共利益，合同履行就是成功的。一旦因为不可抗力、环境变迁引起合同变更，双方需要协商解决，这也是合同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另外，合同管理特别强调的，在公共服务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政府都有权派员审查、审计、评估公共服务外包是否在合同约定的轨道里运行，这是保证公共服务虽然外包，但责任依然归属政府的必要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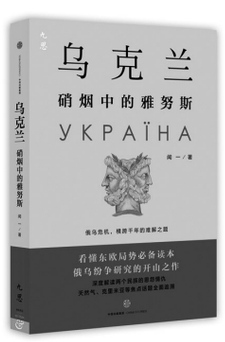
书而思

好书推荐



书名：《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作者：张康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推荐理由：受限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范式与思维习惯，当代主流理论研究对于合作社会的生成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当前，虽然在公共服务提供层面上的合作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但大多数研究并未对政府与社会关系作出根本性反思，并没有根据合作的原则重塑整个社会治理模式，而只是巩固既有协作模式。本书对近代以来的认识传统发起了挑战，从多个维度指出了我们通向合作社会所必须完成的思维转变与实践转向，为人们对合作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与一整套新的分析框架。



书名：《乌克兰：硝烟中的雅努斯》
作者：闻一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

推荐理由：该书着重对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进行探讨，向读者讲述“在千年的岁月中乌俄关系对各自历史进程留下哪些磨灭不掉的痕迹和积重”，深度解读了俄乌两个民族的恩怨情仇，对两国间发生的克里米亚争端、天然气纷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追溯。在闻一看来，俄罗斯乌克兰作为两个民族、两个地区和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历史因素，也有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当今俄乌关系的复杂性和难解性并不完全是由当下的现实政治争斗和各自领导人的决策所引起的，也许它们根植于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之中”。书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系列的历史因素。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

【原文】

维护网络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正所谓“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感知网络安全态势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要全面加强网络安全检查，摸清家底，认清风险，找出漏洞，通报结果，督促整改。要建立统一高效的网络安全风险报告机制、情报共享机制、研判处置机制，准确把握网络安全风险发生的规律、动向、趋势。要建立政府和企业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把企业掌握的大量网络安全信息用起来，龙头企业要带头参加这个机制。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出处】

王复召（伍）被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臣将为大王画计耳。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而万全。文王壹动而功显万世，列为三王，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

——（东汉）班固《汉书·伍被传》

【解读】

伍被（pī），伍子胥后人，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的谋士。刘安想谋反，伍被多次谏阻，刘安就扣押了伍被的父母。上文记述了刘安再次召见伍被时的一段对话。刘安问：“将军听从我了吗？”伍被回答说“不！”并以“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之语进行劝谏，意思是说，聪明的人智虑通达，可以于无声处听有声，于无形处见有形，在事情还未显出征兆时就预见先知。

“无声”“未形”是普通人耳中、眼中的世界，所闻所见皆是一片混沌；而“聪者”“明者”能够于混沌中辨别方向，于迷茫中鉴别真理。这就是大智慧，这就是先知先觉。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借“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这句古语，强调了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在信息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只有对网络安全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预测、预警，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才能预先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维护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强国。

（杨立新）

用典释义